

八年北大荒

◇张抗抗

1966年,我从杭州第一中学毕业。1969年5月,黑龙江省合江地区农场派人来杭州招收知识青年,得到这个消息后,我立即从德清赶到杭州应征。6月,我离开杭州,来到北大荒鹤立河农场。

鹤立河农场

鹤立河发源于小兴安岭,蜿蜒流经兴安台、峻德、新华境内,穿过东大甸子至古城,与梧桐河一并汇入松花江。鹤立镇边上有一座长长的木桥,桥下河床宽阔,雨季来临时水流湍急,名为阿林达河(满语)。小镇铁路以西的土地,有清澈的乌龙河由北向南汩汩贯行。

这个被三条河流环绕的农场,叫鹤立河农场,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,是三江平原的'鱼米之乡",它以前曾是一个劳改农场。

那辆从杭州出发的知青专列,在路上走了三天三夜,出山海关过哈尔滨,从佳木斯再往北60公里,终于停靠在那个叫做鹤立的小站上。大家在6月清冷的小雨中吵吵嚷嚷地等待许久,按名单被分配到各个分场,然后坐上分场来接我们的胶轮拖拉机,各奔东西。我们在泥泞而颠簸的土路上颠了3个多小时,总算到达了目的地——二分场。

我们百十个新来的杭州知青,被分配到各个连队。有干部将我们领走,沿着一条黄沙铺就的小路,前面出现了一堵黄泥垒成的土墙。土墙上有门洞,穿过门洞,是一个极大的院子,被一人多高的土墙围成一个长方形,土墙上圈着一道道生锈的铁丝网。在围墙两端的土墙上方,也有两座小小的木塔,像个岗楼的形状。它们基本上保留了原来劳改农场的格局,只是那岗亭上如今没有了站岗的卫兵。

我们很快便真真切切、确确实实地置身于昔日的劳改农场之中了——由土坯砌成的红瓦苫顶的连队宿舍,一排排整齐地排列在那个大院里。每排宿舍长约60米,只在两端有两个门可供进出;那排长长的宿舍在知青到达前,已经被拦成两段,在中间部位隔开,以便两头可分住男女知青。

从一头的门进得屋去,左右两边分别有两排长炕,一眼可看到房屋的尽头。在这样毫无遮挡、一览无余的空间里,显然极其便于管理。无论是男宿舍还是女宿舍,都不可能有任何个人隐私存在。

鹤立河农场的鹤岗、佳木斯、双鸭山知青是在1968年10月最先到达的。到了1969年6月,又来了我们这一火车杭州知青,后来是宁波知青和温州知青。到1972年,又来了哈尔滨的"小知青"。在这上万名知青陆续到达以前,劳动局已将各个劳改农场的那些刑满留场的就业人员,大部分遣散到黑龙江各县农村,只留下一部分年轻力壮的'生产骨干'和一些

无家可归的单身汉。原来管教劳改犯的管理干部，基本上都留在农场"就地转业"，顺理成章地接着来管理知识青年了。

那些管理干部大多是1958年的转业官兵，来自河南、山西、甘肃、四川等"五湖四海"。他们文化不高，但吃苦耐劳，忠心耿耿。由于他们多年来一直管教劳改犯和刑满就业人员，养成了说话粗声大气、吆五喝六的习惯，说话都是命令式，很快便与知青发生了冲突。

知青们刚刚"毕业"于"文革"的"文攻武卫"，个个伶牙俐齿，能言善辩。况且都能熟练灵活地运用伟大领袖的语录，倒背如流，活学活用。若要讲理，管教们是讲不过知青的；要想不讲理，管教们也胡搅蛮缠不过知青。几次三番后，管教们不再同知青白费口舌，他们自有管教的办法——凡遇有刁钻滑头的，或讲起道理一套一套的知青，逮着一个错，就往场部的"小号"里送，先关你个十天半个月，看你老实不老实！

知青们终于发现顶撞是没有好处的，大权都在管教手里，得罪了管教，那小鞋够穿上几年的。于是，渐渐地就改变了战略战术，从公开顶撞改为暗中捣乱，从硬磨改为软泡，从言语改为行动，从藐视改为戏弄……知青们开始给他们不喜欢的管教起外号，什么"小炉匠""座山雕""鱼头""疤拉眼"等等，私下里全用外号代替了，一时很是解气。如果写"决心书"或是请假条之类的，故意用一些生僻的字，让管教念白字或念不下去，然后哄堂大笑，笑得人仰马翻。更有甚者，为了报复某管教的"管教"，其实更多的时候是为了解馋，就去偷管教家的鸡鸭，还有自留地的青苞米和豆子，用麻袋装了回来煮着吃。

记忆中几个连队的管教大多没怎么为难过我。先是在菜园队，后到了砖瓦厂，再是八分场的科研班，后来是场部文艺宣传队。历任的管教们歪着脑袋斜着眼睛瞥我一眼，看我那个细瘦文弱的小样，眼睛里有几分无奈几分怜悯，知道指望不上我什么，也就懒得同我废话。

两年以后，二分场的领导听说我爱写爱读书，把我调到分场新成立的"政治文化室"，让我管理图书兼管通讯报道。几年后，我开始给报社投稿。

北大荒的寒冬

北大荒的第一个冬天，过得刻骨铭心。

在杭州出发前，每个知青都发了草绿色的棉衣棉裤，还有棉大衣。当时说是免费赠送的，但到了农场几个月后，就开始月月从工资中扣款，由我们自己来偿还。钱未扣清，棉衣已穿在身上，肥肥大大、拖拖拉拉的，有点像当年八路军的红小鬼。每当出工时我总拉在后面，因为裤腰太肥，裤子总往下掉，时不时的要把它提一提。

一双黑色的棉胶鞋，鞋帮上衬着薄毡，再自己垫上毡垫，还是冻脚。鞋都大两号，以便在里头再穿一双毛袜，却还是冷。去菜窖的路上，走上几分钟，脚就僵了。有鹤岗的知青指点说，穿上靰鞡鞋才行。可上哪去弄靰鞡鞋呢？农场的小卖店也没有卖的。鹤岗知青很仗义地说："等我回家，让我妈给你做一双鸡毛袜子，穿上准保暖和。"过了不久，鸡毛袜子果然做好了，是一块三角形的白布套，里头塞着鸡毛（大概是羽绒服的初级阶段）。把三角形的布套抖开，脚伸进去，包裹严实了，再伸到棉胶鞋里去。可是，鸡毛袜厚而蓬松，任我怎么努力，根本就穿不进去。穿出一头大汗，只好作罢。

每人都发了狗皮帽子，草绿色的布面，里子和耳垂是毛茸茸的狗皮，戴上倒是暖和。但女生们都不喜欢，觉得像《林海雪原》里的那个小炉匠，就仍然戴着从南方带来的毛围脖，红的绿的长长地绕了一圈又一圈，远远看着十分鲜艳夺目。那围巾却不遮脑门儿，一出门，呼啸的寒风吹得脑袋疼，若是不戴口罩，在野地里走上十几分钟，那首当其冲的鼻子尖就倒了霉，眼看着一点点发白，失去知觉。要是不及时用雪来搓，搓出热气和血色，鼻子真的就可能冻掉——这句民谚可不是吓唬人的，如果脑袋上不戴棉帽子，脑袋就没有了。脑袋和帽子是

同一个不可分的物体。面对寒冬的淫威，南方知青很快就乖乖屈服。于是，女知青们再是爱美，还得把那顶狗皮帽子戴上，用帽耳朵把两颊包紧，脖子里系上围巾，戴上厚厚的棉手套，如此全副武装，出得门去才不会被冻伤。当时最大的愿望，就是等有了钱，一定要到佳木斯的百货商店去买一顶漂亮的皮帽子。最好是羊剪绒的，帽檐上有无数卷曲的绒毛，看上去挺神气。

还没到三九天，我们就已经着实实地领教了北大荒冬天的厉害。晚上洗了脚以后，出门去倒水，外面冻得‘嘎嘎’响，迎面一口冷风呛得气都透不过来。慌慌张张地泼了水就往屋里跑，手上沾了脸盆里的水，湿手一拽门把手，顷刻间那手就沾在门把手上了，一心想要挣脱，使劲儿一缩手，手上撕下一块皮。

晚上上厕所，厕所里黑咕隆咚的，打着手电筒，也找不着茅坑的板子。逗留时间稍长些，屁股冻得生疼，手也冻僵了，系不上裤子。男生女生都不愿意上厕所，出了门，就地‘宿营’，反正谁也看不见。

“一九二九不出手，三九四九冰上走……”我们很快都学会了那首关于冬天的民谣。成天扳着手指头，盼着‘七九河开，八九雁来，九九加一九，耕牛遍地走’的那个遥远的春天……

我想要自由

1972 年 3 月，我从杭州回到鹤立河农场。“政治文化室’已经关门大吉，我的工作安排成了问题。我不想再回菜园队去，就要求将我调到砖瓦厂去当工人。砖瓦厂的活虽然又脏又累，但是三班倒，时间上比较紧凑。由于有夜班，为了让大家都能休息好，瓦厂领导把知青宿舍隔成四五个人住的一间间小屋，不像连队大宿舍那么乱糟糟的。我一直希望能多一些自己独处的时间用来读书，要是能去瓦厂就好了。再说，瓦厂的窑地只是在春天到秋天这半年开工，到冬季上了大冻，瓦厂就停工休整，肯定有较多的闲暇时间，再没有比瓦厂更适合我的地方了。



2006 年 7 月 1 日，张抗抗(右)参观北大荒博物馆

被知青背后称为‘座山雕’的李队长，外表严厉而心地善良，他收下了我。

领导分配我当晾瓦工，即压瓦机里压出来的瓦片泥坯，要用独轮车推到瓦房里，瓦房里有一排排的木架，上面穿着一层层粗铁丝，用来摆放晾瓦板(有点像江南农村的蚕房，一层层放满了养蚕的竹匾)。晾瓦工的活儿就是把小车上放着十几块湿瓦坯的瓦板，用最快的速度一块块取下来，然后一块块地准确地递到铁丝上去。上下左右的先后秩序要算得精确，空间利用要得当，动作要敏捷利索，技术性挺强的。一块湿瓦重 5 斤左右，8 个小时工作期间，差不多要搬动几百次瓦板，下蹲上伸几百次，一个班次下来，累得胳膊都抬不起来了。我干得不错，运瓦的小车工对我挺满意，我们的速度总是遥遥领先。

到了农忙时节，瓦厂的‘工人’轮班去支援第一线，铲地、撒化肥、割麦子、掰苞米什么的，我一次都没有落后过。

红娅是宁波知青，小我好几岁，但个子比我略高些，丰满健壮，干活特别能吃苦，很有正义感，整天开开心心嘻嘻哈哈的，当时担任知

青排长。她就住在我隔壁，见我一有空就看书，便常到我的屋子里来借书或聊天。她也渴望以后能有机会去读大学，但又觉得这个目标实在是太遥远了。通过她，我认识了另外两个宁波知青汤翠翠和陈朗，她们都是爱学习的人，知识面也很广。她们对我很友好，大家谈天说地挺投机的。

有一天，我偶尔到翠翠和陈朗的宿舍去"唠嗑"，陈朗忽然好奇地问我："你这一生中，最想实现的愿望是什么？"

她问得很诚恳，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说："我想要自由。"

至今我还记得在我说完这句话的时候，陈朗完全愣住了。她纯净的脑海里闪过一个强烈的问号："你疯啦？你怎么敢要自由？自由可是资产阶级那一套啊……"

话一出口，我就后悔了，随即自我"纠正"说："我说的自由，意思是……是……就是一个人能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能够自由地安排自己的时间……这不是政治的概念，不是的……"陈朗听完后，理解地点了点头，翠翠也表示赞同。

回到宿舍，我左思右想，越想越觉得不对头。自由是一个多么敏感多么可怕的字眼儿，自由就等于罪恶等于反动，自由是绝对的资产阶级思想，是绝对的个人主义，你为什么不要革命不要胜利偏要自由？你想要自由就是想要和平演变想要复辟想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！你的阶级本性因此彻底暴露无遗……我内心惶惶然心烦意乱，责怪自己太容易轻信别人，恼恨自己太坦率太幼稚，弄不好再开一次我的"批判会"，再贴我一次"大字报"，我可怎么在瓦厂呆下去？

关于"自由"的谈话以后的一些日子，我除了出工去瓦房，连门儿也不串。

大学梦破

1973 年冬天，我随瓦厂的大部分知青到小兴安岭去伐木，一直到开春才下山。下山后，我就调到八分场去了。

八分场离二分场 8 里地，靠近水库，以畜牧业为主，养着几百匹枣红色的军马。我被分配在科研班，搞小麦的种子试验。

在科研班干了一段时间，分场的邮递员病了，主任就让我去替代他，空余时间还是搞通讯报道，往总场广播站送稿。

那年夏天传来的消息令人振奋，据说将要加大工农兵大学生的招生名额，并对推荐入学的知青进行文化考试。我心里燃起了一丝微弱的希望，若要进行文化考试，倒是对我十分有利的，我想在文化考试上应该没什么问题。

随即又听说，还是首先要基层推荐，政治标准仍是第一位的。心情顿时十分沮丧，家庭出身、政治表现、领导关系……全都是劣势，连个团员也不是，凭哪一条来推荐我呢？我顶多属于中不溜吧。不过，假如名额多一点呢？八分场的知青排排队，若是有 10 个名额，就有可能轮到我了。我开始积极复习功课起来。

过了些天，开始由群众推荐上大学的第一轮人选，我被推荐上了。科研班有个女生悄悄地告诉我，这推荐名单不算数，还要筛选一次，"刷"掉一半人，最后再由分场领导决定。说你应该去找找某某主任，他权力最大，他想让谁去谁就准能去。我正犹豫着要不要去找某某主任，就听说一个绰号叫"小德张"的鹤岗男生，在到处散布我的坏话，说我在二分场的政治表现如何如何不好，决不能把我推荐到第二轮名单上。我很生气地跑去质问他，说："你想上大学就争取好了，我和你是平等的，干吗要踩着我上？"他连连解释，赖得一干二净。我想他既然这么在意我，是否说明我是有希望的呢？想了又想，决定还是不去找某某主任，听天由命吧。又过了几天，第二轮名单上，我果然被刷下来了。

到了秋天，被推荐入学的正式名单宣布了，大概有五六个人。其中有两个人平时表现很一般，却上了大城市的名牌大学，真是让人又羡慕又气愤。那天，我回到宿舍，躺在炕上闷闷不乐。科研班的一个知青走过来，就是那个

叫我去找找某某主任的那个女生，她一向对我很好。她坐在我身边，说了一些安慰我的话。末了，她贴着我的耳朵气恼地说："我不是叫你去找某某主任吗？你不听，你真的相信那些人都是推荐上去的呀？实话告诉你吧，那个某某宁波女生，是给某某主任送了厚礼的，她把一只上海牌手表放在茶叶罐里送去了，你想想，某某主任能不把她拽上去吗？"

匿名信

大学梦破碎之后，我知道自己很难再有上学的机会了，唯有依靠自学上进。

1972 年秋，我还在二分场瓦厂时，就在上海《解放日报》上发表了我的小说处女作《灯》，后来又在《文汇报》上发表了散文《大森林的主人》。调到八分场后，我一直兼管分场的通讯报道，也常去总场参加报道员会议。1973 年秋，总场政治部宣传科将我借调到了总场文艺宣传队，作为专职创作员，编写反映农场生活的文艺节目。

其实，我对文艺节目并不在行，什么二人转、山东快书、表演唱、小话剧等群众"喜闻乐见"的艺术形式，我写起来很费劲。我曾写过一个表现知青生活的韵白剧《农村也是大学校》，还写过一个组诗联唱，演出后反应平平。每次写完一个节目，我的任务就暂时告一段落，悠哉游哉的无所事事。到了元旦、春节期间，文艺宣传队到各个分场以及兄弟农场去慰问演出，转上一圈十天半个月。那时候，我就要求留在总场文艺宣传队队部宿舍给大家看家。

其实，那时我心里藏着一个"绝密"的计划，不敢告诉任何人。自从我在报纸上发表了"作品"以后，受到极大鼓舞，写作的欲望空前高涨。宣传队的文艺节目实在引不起我太大的兴趣，我打算构思一部描写知青生活的中篇小说。还在八分场科研班的时候，就已忙里偷闲地写出了一部分提纲。我正愁自己的进度太慢，突然给了我半个月的空闲时间，岂不是天赐良机？我准备用这段时间，把提纲完成。

那部中篇小说的提纲，后来终于变成了一部长篇小说，也就是 1975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分界线》。到了那年 3 月，我发现自己患了甲状腺囊肿，急需手术，便请了探亲假回杭州看病。利用病假又再续了几个月的事假，写出了小说初稿，后又修改两次，至第二年秋天，《分界线》正式面世。

《分界线》出版后，我打算尽快返回农场。但上海人民出版社准备继续留我在上海呆一段时间，替出版社短期帮忙。出版社征求我的意见，我一口答应了。尽管我已经一年多没有领到粮票，也没有一分钱的工资，但我还是愿意再在上海住一段时间，出版社的文化氛围，毕竟比北大荒更吸引我。

我每天将知青的来稿筛选出来，附上我的"审稿"意见，然后提交给谢泉铭和陈向明编辑，由他们作出评议，我再给知青作者回信，有的直接退稿，有的让对方修改。对方的修改稿返回以后，再审阅再评议，直到定稿。老谢和老陈很尊重我这个"知青"作者，总是鼓励我发表意见，尽可能独立地处理来稿。晚上，编辑们下



年轻时的张抗抗

班后，我可以留在办公室里写些小东西，还有许多好书可看。

1976 年 5 月的一天，工宣队的一位师傅忽然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去谈话。说经过出版社领导研究，你可以回黑龙江的农场去了，而且应该尽快离开上海。我当时脑子"嗡"地一下，这个突如其来的决定使我颇感意外，就好像我犯了什么错误，忽然接到了出版社的"逐客令"。我神色沮丧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工宣队的师傅很和蔼地安慰我说："尽管出版社对你这一年多在上海期间的工作是满意的，但你离开北大荒的时间太长了，容易脱离生活、脱离集体，应该早些回到火热的生活实践中去。早回去比晚回去对你更为有利。"他说得很委婉也很诚恳，但我还是觉得他话里有话，似乎有一些言外之音和难言之隐，让我琢磨不透。

临走前，陈向明编辑特地为我开了一个欢送会。会上，大家都说了许多感人的话，出版社的编辑们对我的为人和工作的评价，听得我热泪盈眶。但我心里仍浮上几丝淡淡的委屈和疑问："既然我这么好，为什么就突然让我走了呢？这其中一定有缘故，只是他们不愿意也不便对我说实话罢了。"

欢送会后，出版社还为我出具了一份工作鉴定，用公函的形式发往农场，对我在上海期间的表现给予充分的肯定。

5 月下旬，我离开上海到杭州家里小住，几日后便毅然返回了鹤立河农场。回到农场后，事实很快证实了我的预感和一部分猜测。当真相被"揭穿"时，我竟然丝毫没有感到意外——匿名信！果然是匿名信！

回到农场后，我住在场部招待所，等待重新安排工作。总场宣传科的同志们希望我能到宣传科搞通讯报道，竭力说服领导让我留在场部。他们安慰我说："那封匿名信虽然把你赶回了农场，但那并不代表农场组织上的意见，组织上对你的写作是赞许的。去年出版社为你请创作假，连农场总局宣传处都表示了支持的态度。匿名信只是个别人出于嫉妒而写，你完全不必理会。"

我要上学去

从上海回到农场后，我被留在了总场宣传科搞通讯报道。

我在场部机关整整工作了一年。这段时间里，过去人们对我的种种误解、种种闲言碎语，都在对我的逐步了解中渐渐消散了。但在那一年中，我几乎没有写出一篇像样的文学作品。

1976 年年底，一位姓朱的老师，从省文化厅专程来鹤立河农场找我，问我是否愿意到哈尔滨去上学？黑龙江省艺术学校有一个编剧专业，是省文化局为了培养全省各地"自学成才"的知青作者特地开设的，学制两年，毕业后就留在省城的专业文艺团体从事创作。省文化局创评办知道我已出版过长篇小说，就推荐了我。若是愿意去，过了春节就办手续参加考试，1977 年 3 月份正式开学。

我说："我刚学着写小说，我不会编剧，怕考不上。"

他说："你有作品，文化局党委研究过，可以破例免试。"

我又问："毕业后我不想搞戏剧，我要写小说，怎么办？"

他耐心地说："到那时候再看情况，文化局也需要搞小说创作的人嘛。"

省艺术学校是一所中专，它显然不是我一直渴望的那种大学。但它培养专门的文艺创作人才，一定可以学到很多专业知识。何况毕业后就搞专业创作，正是我盼望多年、实现梦想的一个夙愿。如果真的能让我从事写作，我宁可放弃返回杭州，放弃将来可能会有的上大学的机会。

火速写信同父母商量，在得到了杭州父母的支持后，我给朱老师写了一封信，表示我愿意去省艺校上学。那年的春节过得心神不定，过完春节，哈尔滨果然来了一位姓赵的老师，替我办理入学手续。宣传科和场部主管文教的政治部董主任都为我高兴，祝贺我终于能去进一步"深造"，表示要为我大开绿灯。一切都顺

理成章，一切都无可非议，我即将离开生活了八年的鹤立河农场，告别这里所有的恩恩怨怨，开始我人生的新阶段。

但完全没有预料到——上学去，也会那么艰难。我这个对农场几乎是“百无一用”的人，要离开农场，却费了那么大的周折。

当时，鹤立河农场的一把手 S 书记“家长制”作风严重，机关干部对他多有微词。

我对他也比较反感，平时敬而远之。

我当然没想到，S 书记会因此而记恨我，在我上学的事上从中作梗。据说，春节后哈尔滨来的那位赵老师，第一次同 S 书记商谈我上学的事，就遇到了麻烦。赵老师公务在身，心情迫切，希望立即办完审批手续。因此，一看 S 书记板着面孔，打着官腔，说农场工作需要，不能放我去上学，就有些着急。又因自己来自省城，经常来往省内各地，各级领导都是恭恭敬敬地以礼相待，而到了鹤立河，遇上一位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的“土皇帝”，言辞就有些过激。急躁之下，说出一句书生意气十足的气话：“你放也得放，不放也得放，上学也是革命的需要，你无权阻拦！”这一下子可把 S 书记彻底惹翻，当即“以党的化身”严词拒绝说：“我倒让你看看，究竟是你有权还是我有权？我就不放人，看你怎么着！”

事情因此僵持下来，董主任和姜科长几经斡旋，S 书记就是不肯改口。赵老师只得返回了哈尔滨。

我的上学梦几乎化为泡影。但董主任和他的爱人安慰我说，如果哈尔滨的学校能为我保留名额，他们还可以再设法做做工作。过一段时间，等 S 书记的气消了以后，和他好好谈谈，也许他会改变主意的。我受到启发和鼓舞，便给省文化局延泽民局长写了一封信，言辞恳切，希望能再“宽延”一段时间，我一定争取得到农场批准。过了些日子，我得到赵老师的答复，说：“省文化局非常重视此事，同意为我保留名额，什么时候能把农场的工作做通，就什么时候来哈尔滨上学。”

那时已是 3 月，省艺校已经正式开学。我面对这难以跨越的一步之差，真是忧心如焚；却又还想保持自己的清高和人格，不愿低头去“求”S 书记。

到了 4 月，董主任将此事提交党委，党委会正式集体讨论，试图以正常的组织程序来抵制个别领导的家长制作风。但据说那次党委会开“砸”了，会上 S 书记仍是蛮不讲理，他的态度终于激起了董主任的义愤。平日谦和温良的董主任，第一次在党委会上发了脾气，激烈的争论中，他对 S 书记拍了桌子。这下子捅了马蜂窝，S 书记一怒之下，将手中的玻璃杯朝董主任扔了过去，把董主任的手划了一个大口子，流血不止。一把手和二把手就此反目，党委会匆匆收场，我的“问题”又一次搁浅。

事情到了如此地步，我即便不走，日后在农场的处境也可想而知。我在生气焦虑之余，“紧急动员”各地朋友的关系，希望能有一位高层领导从中斡旋，“攻克”S 书记这座堡垒。

还算幸运，由上海的阎阿姨介绍，总算找到了一位原黑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骆子程叔叔。骆叔叔很同情也很支持我，他给佳木斯农垦总局的赵清景局长打了电话，赵清景局长又亲自给 S 书记打了电话。S 书记面对农场系统的“最高领导人”的明确指示，立即改口说：“场部只是暂时挽留她，根本没有阻拦的意思，她真要走，我马上放行。”

后来的几天，我像打仗一样火速办完了各种手续，急急打点行装，生怕 S 书记反悔，又节外生枝。其实，我对农场的“管教”历来并无恶感，偏偏到了离开农场前夕，遇到了这样一位滥用职权的“老爷”，也算应了那句“好事多磨”的老话。

1977 年 6 月下旬，正巧是我到达鹤立河农场整整八年。在一个杨树漫天飞花的清晨，我与前来送行的农场同事们挥手告别，登上了去哈尔滨的火车。从此结束了我八年的北大荒知青生涯。

（徐志刚整理）

往事漫忆